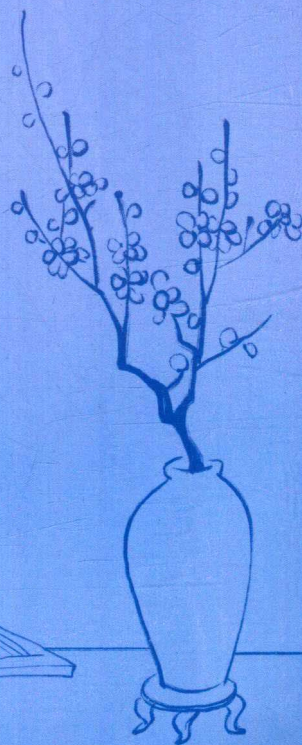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穿越文字的迷雾

王涘海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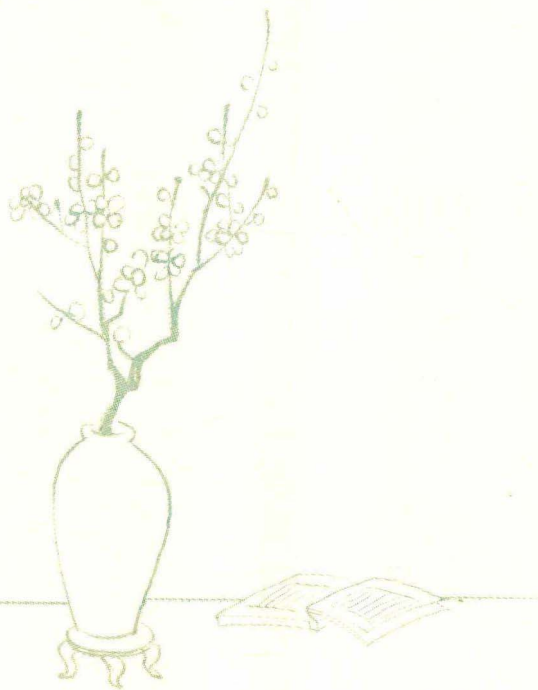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
“三百工程”系列丛书



穿越文字的迷雾

王涘海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越文字的迷雾 / 王涘海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 - 7 - 5648 - 3454 - 8

I. ①穿…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文集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06. 7 - 53②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5630 号

穿越文字的迷雾

Chuangyue Wenzhi de Miwu

王涘海 著

- ◇策划组稿: 李 阳
- ◇责任编辑: 李 进 江洪波
- ◇责任校对: 胡晓军
-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 8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 ◇经销: 新华书店
-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开本: 710mm × 1000mm 1/16
- ◇印张: 11. 5
- ◇字数: 230 千字
- ◇版次: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号: ISBN 978 - 7 - 5648 - 3454 - 8
- ◇定价: 58. 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731 - 88872256 88872636

投稿热线: 0731 - 88872256 13975805626 QQ: 1349748847

目录

第一辑 纵论	(001)
“红色经典”在二十一世纪	(001)
新时期小说创作指瑕	(010)
把脉当下文艺评论	(016)
山药蛋派十七年的现实主义之路	(018)
十七年文学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消解	(024)
大众语境下的网络文学	(032)
文学语言与模糊修辞	(037)
孔子创新教育思想举隅	(045)
第二辑 现场	(051)
张贤亮小说的精神启示	(051)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情结	(059)
高晓声农村小说的文化内蕴	(066)
女性生命的诗意情怀粲然绽放	(072)
因爱而歌 如梦之诗	(077)
《爱历元年》的三个维度	(083)
不老姜贻斌	(086)
诗意而诡谲的乡村乌托邦	(087)

第三辑 评点	(090)
思想在孤独中闪光	(090)
国民性批判的新视角	(097)
一路走来都是诗	(100)
情至深处皆文章	(104)
诗画中的爱情咏叹调	(106)
守望，抵达抑或出发	(107)
视觉与心灵的双重清洗	(110)
大智若愚写华章	(112)
底层叙事与时代诉求	(116)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精彩对话	(121)
第四辑 镜像	(124)
元结与朝阳岩	(124)
陶渊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126)
鲁迅小说叙述者特色	
——以《呐喊》《彷徨》为例	(135)
阿Q：革命与反革命的悖谬	(141)
旷野中的突围	(148)
全媒体时代作家何为	
——邱华栋访谈录	(155)
用传统美德荡涤人心	(165)
唯有“根深”才能“叶茂”	(168)
空符的建立及审美价值	(169)
艺术正途	(176)
静静的日子流啊流（代后记）	(178)

第一辑 纵论

“红色经典”在二十一世纪

关于“红色经典”的概念，有不同的说法。一是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5月25日发布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中有着明确的定位，即“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另一个是在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视协举办的“红色经典”改编创作座谈会上，一批专家学者提炼出来的，他们认为，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产生的大量反映时代、对人民群众有重要影响的一批小说、戏剧、电影等作品，都可以归入“红色经典”，如代表作有《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红色娘子军》等。也有学者提出：“红色经典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做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①虽然说法不同，但核心意思都是一样的，都紧扣“红色”与“经典”两词语来做文章。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红色”，指“象征革命或政治觉悟高”。“经典”，指“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不过，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如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就不赞同红色经典的提法，他认为：“‘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的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

^① 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成为‘经典’”，“‘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①这是由于判断的标准不同而得出相悖的看法，但反对的声音不是社会主流，红色经典这个词语还是流行起来，越来越引起公众的瞩目。

一、“红色经典热”的兴起

“红色经典”记录了革命先贤们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及取得的巨大的贡献。它们曾激励了几代人，曾让几代人为之痴迷，它们一度成为人们的精神宝典。《红旗谱》曾经重印三十余次，发行达500万册之多，在电影里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至今让观众刻骨铭心。杨沫的《青春之歌》出版后，前后销售四五百万册，被翻译成日、英、法、越、朝、俄、希腊、阿拉伯、印尼、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十几国文字出版。在日本，从1960年翻译出版，到1965年，共印刷12次，出版20万册，这在当时的日本也是惊人的数字。《青春之歌》的红火，以至于当时的人们以不知林道静为耻，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等革命形象像巨大的磁力一样吸引过整整一代人。新时期以后，承载着几代人的生活想象、青春热情和成长希望的风靡一时的“红色经典”随着社会风尚的改变、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文学地位的下降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影音公司制作的“红太阳系列”新节奏翻唱磁带销量惊人，一年销量几百万盒，跌破人的眼镜。之后，大量的革命老歌被翻唱，杀入流行歌坛，广为人们传唱。1995年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观众热烈的追捧，场场爆满，这是红色经典的预热。最早提出“红色经典”这一语词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在1997年重印了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等经典作品，他们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红色经典丛书”，后来他们又推出了《经典红诗》，“红色经典”这个新创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传播媒体。大约本世纪初，红色经典热开始席卷全国。这主要是影视界掀起了一股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红岩》《小兵张嘎》《红日》《红旗谱》《烈火金刚》《双枪李向阳》

^①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英雄虎胆》等二十七年时期（1949—1976）经典作品（包括影视作品）纷纷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已渐渐被大众遗忘的红色经典文本，再次风靡一时，人们争相阅读。在影视界，单单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就有近40部“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列入规划批准立项，共约850集。已经拍出的影片收视率高，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媒体也闻风而动，如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电影传奇”与“重走长征路”等怀旧节目，以回忆的方式再现当年的人、事、剧，江西卫视开办“中国红歌会”倾力打造品牌栏目，“红色经典”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传统的平面媒体也不甘示弱，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了青年作家薛荣全新演绎的中篇小说《沙家浜》，而原作品《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曾家喻户晓的京剧样板戏，这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又甚嚣尘上。2004年，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对红色经典改编市场进行了规范、收缩了政策，红色经典热虽热度下降，但已拍成的影视剧一直在各电视台轮番播放，还有一些改编剧获准拍摄，如《小兵张嘎》《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均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学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的讨论与争鸣也一直未停止，因此，不能说红色经典热已经消退了。2007年一部长达26集的根据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似乎红色经典热又有了抬头的趋势。

二、“红色经典热”的喜与忧

“红色经典”热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首先，它是我国国力日益强盛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国家国际地位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日益增强，饮水思源，人们必然渴望了解先贤们的英雄壮举、丰功伟绩。同时，人民生活的富足，促使人们对精神的追求更胜于对物质的追求，精神生活的品位与层次已经成为了评价人们幸福感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其次，如今的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及全球一体化速度的加快，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俗欲也不断挑战正义与传统美德，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失去信仰的人们孤独感日益加强，他们渴望返璞归真，渴望寻找失去的感动，渴望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力量，以前的那种简单、淳朴、充满激情与理想的生活反而成了他们的向往。再者，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也契

合了人们的怀旧心理与青年人的怀疑与好奇心理。中老年人通过红色经典来钩沉逝去的点点滴滴。而面对社会的复杂多变与社会竞争的加剧，青年人也变得日益怀旧起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曾通过新浪网对2493名公众进行了一项调查（89.7%为“80后”），结果显示，43.7%的人表示自己有时怀旧，37.5%的人经常怀旧。至于为什么怀旧，61.2%的人认为怀旧“可以使人得到心灵的慰藉和满足”，44.9%的人认为怀旧“可以寻回失落的精神家园”^①。青年人往往具有叛逆精神，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好奇与怀疑，红色经典经常见诸于官方的各种传媒，红色经典中的英雄人物真的像官方宣传的那样伟大吗？党是怎样带领人民建立和建设国家的？那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青年人带着怀疑与好奇走进“红色经典”。第四，国家意识形态与商业社会的合谋。“红色经典”是主旋律、阶级意志的最好体现。“红色经典”的推广与普及本来是政府一直致力的一项工作。政府也鼓励民间自觉从事这样一些工作。社会越是民主，经济越是发达，统治者越是迫切需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政权得到稳定。而在商业社会里，投资者无疑成了“红色经典热”的最大的推手，就电视剧改编来说，投资者投资“红色经典”作品，风险小，也容易得到政府的扶持，比如容易通过审查、可以占据电视的黄金时段、在国内的各种评奖活动中有优势，这可以使他们既获得声誉又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红色经典”的改编弥补了原作或原剧的不足（因影视改编在“红色经典”热潮中贡献最大、争议最大，所以后文将着重探讨“红色经典”影视改编）。红色经典诞生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原作或原剧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时的创作理念是文学为政治服务，因此红色经典过分强调政治的元素，而忽视了文艺创作的规律。在原作或原剧里，刻画、塑造人物缺乏深度，显得简单粗暴，人物形象变得脸谱化，性格变得平面化。如正面人物形象普遍都孔武有力、说话掷地有声，似乎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反面人物形象普遍猥琐，在银屏上一眼可以分出人物的好坏。故事情节也简单，缺乏悬念，基本上平铺直叙，故事的结局也了然于心。表现范围狭窄、感情生活贫乏、缺乏人情人性，具有极强的政治说教意味。新改编的红

^① 《“80后”进入加速怀旧时代》，《中国青年报》2008年7月18日。

色经典剧，突破了原作或原剧的窠臼，以独特的视角和创新手段解说历史，不说教、不枯燥，有看头，既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再现了红色经典生生不息的魅力，又赋予了红色经典核心精神新时代的教化内涵。一些改编剧在塑造人物时，注意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让他们回到生活中去，展示他们的喜怒哀乐，满足了大众的多层次的审美需求。如《红旗谱》在保持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结合时代作了适当的拓展与延伸，增加了冯月堂、李稚天、古文应、桂仙等人物，丰富了剧情，增加了剧情的吸引力，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增强了动作性、设置了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同时注意了人物性格冲突和性格对比的刻画，使人物的极致行为显得更合理、更有其必然性，对朱老忠、贾湘农、江涛、运涛等革命人士的刻画更人性化、更有人情味，适当增加了男女之间美好情感的表现。

不容置疑的是，表面繁荣的红色经典热背后，隐藏着种种忧患。其一，商业痕迹特别明显。很多改编者立足点不是为弘扬民族精神、挖掘红色经典新的品质，而是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和商业效应。因此煽情性成了这类影视剧的首选，他们大打情字牌，强力关注人物的私生活，红色经典变成了纯娱乐性的作品。电视剧版的《林海雪原》肆意英雄人物杨子荣身上编织“桃色新闻”，杨子荣陷入了“三角恋”，还与土匪之妻有情感瓜葛等，损害了英雄形象，也使年轻人对他的接受度大打折扣。《红色娘子军》被改编成了一部“青春偶像剧”，吴琼花与洪常青之间的情感纠葛成为该剧的主要看点，该剧的宣传剧照是洪常青与吴琼花的激情拥吻。当然，红色经典最大的不足，走的是阶级路线，二元对立的思维，缺乏的就是细腻的情感表现，看点不够。但是，很多新改编剧过犹不及，对比之下，朴素的情爱反而给人别样的感觉，如空谷中的幽兰、旷野中的百合，让人心旷神怡。煽情之外，改编者还或营造故作高深的悬念，其实相当浅薄；或盲目追求容量，扩大戏份，导致情节拖沓，一位学生曾评价改编剧《小兵张嘎》说：“这个片子，我刚一开始看，觉得还不错，到了后来，气死我了，后十集我干脆不看了。感觉就是拖沓，嘎子也不可爱。比如嘎子要给区队报告的事，一次次阴差阳错，反反复复拍了七八集，一直要演到十五六集。更可气的还在后面：区队十万火急地找嘎子落实情况，嘎子也急着找区队，找到之后没有人理嘎子了，嘎子也变成傻子了，不提真假特派员的事了。根本没有人来问问嘎子特派员的来龙去脉，

就进行下一步行动了！情节有些前后不搭。”^①就音乐作品来说，流行乐坛的一些歌手对革命歌曲进行所谓的改编，原本铿锵激昂的歌曲变成了歌手用摇滚的方法歇斯底里地吼叫，严肃的情感被恶俗取代。其二，理解能力欠缺。改编者与原作者的思想境界不一样，过去对电影电视的拍摄有更多更高的要求，以前的拍摄者多半抱着一腔热情，一股无产阶级的热血全身投入，把之当成生命的事业来对待，甚至比生命更重要。而现在的人要浮躁得多，缺乏耐心，表面似乎亲近“红色经典”，一旦近身之后很难深入进去。导演、演员由于心态浮躁，不仔细研读原著，不去深入了解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不去探求人物思想性格形成的深层原因，而表演不到位、道具不到位、环境烘托不到位，红色经典演成了现代人、现代剧。新版电视剧《敌后武工队》过分渲染战争的激烈，给人感觉仿佛在观赏一场现代化的战争。或者盲目灌注“人情”“人性”观念，放大英雄人物的缺点，减少反面人物的恶行，“红色经典”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故事已非那个故事，情节更非那个情节，更重要的是精神早已背离。《林海雪原》中一身正气的杨子荣变成了油腔滑调、牢骚满腹、爱搞小动作、一身江湖气的伙夫，这样的改编就与原作相去甚远，甚至面目全非，遭到观众的批评也不奇怪了。其三，更有甚者，很多好事者以戏谑调侃的方式对经典恶搞。《闪闪的红星》一直都是最经典的革命电影，它影响了几代人，影片中的插曲至今还广为传唱。但《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摧毁了人们对潘冬子的记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人们脑海的潘冬子形象由一个备受迫害奋起反抗的小革命英雄变成了追求时尚引人发笑的无知小儿，这样的改编，人们在情感上无论如何是无法接受的。红色经典改编虽然红红火火，但是很多作品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红色经典的名义去实现自己浅薄的改编理念，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受到了许多专家和观众的批评。“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拆解、拼贴、戏说或者改写，使之平面化、商品化，消解了其原本的意义深度，张扬了感官刺激和情绪宣泄。颠覆经典者在冒犯常规、调侃正经、亵渎传统，希望由此获得一时快感，往往不过是‘愤青’泄愤，网民玩乐，痞子把玩，而某些商家传媒正好趁机而入，吹捧炒作，于是颠覆或者‘恶搞’经典的风气就酿成了文化领域的沙尘暴，越刮越凶。”^②针

① 《“红色经典”翻拍不休，电视改编不讨好难免尴尬》，新华网，2004年8月26日。

② 转引自曹建文著：《“红色经典”不容恶搞》，《光明日报》2006年8月10日。

对混乱的影视改编市场，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5月发布了《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郑重提出“必须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众已经形成的认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绝不允许对‘红色经典’进行低俗描写、杜撰亵渎，确保‘红色经典’电视剧创作生产的健康发展。”国家广电总局看到了亵渎经典的严重后果，重拳出击，试图以行政的力量规范混乱的“红色经典”的改编市场。

“红色经典”，再现了党的丰功伟绩及革命先贤们的高大形象，具有恒久生命力。它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鉴赏与检验大浪淘沙之后脱颖而出，已经成为了我国人民巨大的精神财富。卡尔维诺曾说：“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自己以遗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①我们的“红色经典”中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曾焕发为我们民族的一种可贵的集体无意识。“红色经典热”的出现，也说明在新的时代这种精神仍然有强大的市场，观众仍然有阅读期待。我们应该珍惜我们的经典。对经典的反叛与颠覆永远只能是社会的暗流，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英国人曾言：宁愿失去英伦三岛，也不能失去莎士比亚。这是极而言之，但它说明，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了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积淀对于民族精神建构的重要性。作为曾经长期遭受战争洗礼，后又蒙受十年动乱、浩劫的我们来说，更应该珍惜我们现当代文化中不多的经典。但我们很多改编者以不严肃的态度投身经典的拍摄正使得“红色经典”改编处于尴尬的境地。《林海雪原》播出后，原作者曲波的夫人刘波在《北京青年报》上撰文指责电视剧“胡编乱改”；杨子荣的养子欲以“侵犯杨子荣名誉权”为由起诉剧组；杨子荣的父老乡亲以“家乡人民”的身份，向媒体表达了对该剧的“极其不满”，认为其丑化了杨子荣的形象；新版《沙家浜》里，聪慧、忠诚的地下党员阿庆嫂却不分敌我，与胡传魁和郭建光都卷入情感漩涡，俨然成了一个风流老板娘，严肃的敌我斗争却成了个人恩怨；《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没开拍，剧组就开始炒作，某某某、某某某大明星将加盟出演。针对这些现象，戏剧理论家郭汉城说：“现在的一些改编者把人性卑微化，认为只有七情六欲才是人性，英雄的人性就是七情六欲，这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是‘自毁精神长城’。”著名导演谢铁骊认为，任意地删改

^①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剧情，删添主要人物，创作上“直、露、多、粗”的都不是真正的改编，而是对经典的亵渎。^①温儒敏教授亦不无忧虑地表示：“对民族文化经典做深入浅出的阐释和传播，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不应该以歪曲或者调侃、拆解经典作为代价。现在一些‘戏说’或‘恶搞’的作品，虽然很搞笑，能吸引人，但往往也带有虚无主义和商业气息，对年轻人没有任何益处。”往更深远处说，对经典的亵渎将会冲垮人们的道德底线，颠覆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导致人们漠视中国的革命历史，乃至动摇党的统治基础。

三、理性地对待“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极其复杂的，它包含了太多的内容。作为特定时代的文艺作品，它不只是意识形态符码的组织生产，它既是政治话语又是文艺话语。作为政治话语它传达着统治者的统治理念及历史功绩。作为文艺话语，它又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与记忆。这并不是说“红色经典”应该一成不变，不可触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体验，他有权对经典给出个人化的诠释，甚至可以进行批评。但是个人体验与公共体验、个人审美趣味与公众审美趣味是不可混淆的。因此，要对经典改编然后占据国家资源向公众推广那就要抱严肃的态度，慎之又慎了，新版《红旗谱》曾四易其稿，历经四年拍摄才成。温儒敏教授指出：“经典都会带有特定的时代烙印，甚至可能有局限性，有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既要有感情，还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时代要求的部分，当然可以采取客观的态度。现在那种随意颠覆甚至‘恶搞’经典的做法，我看就根本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所以对经典是珍惜、尊重，还是功利的消费、利用甚至亵渎，既是检验改编者价值立场的重要标尺，同时也是改编的边界所在。”这就要求红色经典的改编者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有较强的历史意识、审美能力及健康的审美情趣；要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艺术观去塑造人物、重叙历史；要尊重文艺创作规律和社会公共道德，切勿以市场规律取代一切，力争在市场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社会公共道德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著名评论家彭加瑾指出：“时代的差异容易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风尚与人们审美趣味与今

^① 姜薇、于静：《理论界关注红色经典：直露、多粗不是真正的改编》，《北京青年报》2004年5月25日。

天大不相同，如何把以往‘历史’变成鲜活的‘当代史’绝非易事。‘再创造’的字面意义、形式、技术意义人们容易了解；但对它的深层意义，文化、艺术的意义却常常容易忽视。”^①红色经典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经典的地方在哪里？不是它的语句，不是它的表现手法，不是它记录的社会事件，而是作品的深层意义，是作品中流动的精神：是作者的，是英雄人物的，也是时代的。因此，改编的时候还要把握尺度，主题和精神不可乱改，这是改编的底线。否则，完全可以另编一个故事，何必改编呢？新版《小兵张嘎》继承了原作基本精神，讴歌革命先辈，弘扬民族精神，在承载教育功能的同时，始终注重保留儿童剧的特色。各界对该剧虽有诟病，但总体评价还是不错的。该剧拍完后，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影视部还专门召集部分专家举行了“《小兵张嘎》与‘红色经典’改编研讨会”，总结经验。电视版《51号兵站》的成功应该成为影视人可供借鉴的样板。根据上世纪60年代的同名经典电影改编的电视连续剧《51号兵站》2007年在央视播出后掀起了红色经典的新一轮收视热潮。据说，导演娄健为了拍好这部电视剧，广泛查阅历史资料，十几次修改剧本。他虽增加了一些人物和情节。但是这些情节皆非凭空捏造，都有历史根据。后来，该剧获2007年“南方盛典”最佳电视剧，主演杜淳获最佳男主角。2007年“南方盛典”对之的评价是：“它追加故事情节但尊重原著，还原历史情感但保证戏剧性，没有颠覆而是再造了银屏上的英雄，令怀旧者耳目一新，新观众为之着迷……完全有可能与经典媲美。”很多网友都留言表示，“电视版《51号兵站》没有受到非议，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故事框架与原电影基本保持一致，这种原汁原味的效果看起来特别的亲切。”

其实，对正义和英雄的渴望、对历史的继承和当代人的教化，不一定非要改编经典。一窝蜂上，反而很难拍好经典，也容易糟蹋经典，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孩子们造成错觉，以为过去的经典如此而已。媒体可以经常性地推出一些经典老片或名著，还可策划一些相关的活动来加深、加强人们对经典的理解与消化，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电影传奇》就策划得很好，让人在得到感官享受的同时也享受了一场道德盛宴。像这样的节目或活动可以多搞，一样也可以满足各方的需求。要对经典心存敬畏，不要像在家里吃饭穿衣一样太

^① 彭加瑾：《“红色经典”改编似一把双刃剑——兼评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文汇报》2004年2月3日。

过随便，要反复论证，等思考成熟、时机成熟之时再重新演绎，否则演绎不好不但不能给人以教育，反而显得滑稽可笑、贻笑后人。也希望接受大众多读原著，往往文字表述比形象表述更深刻，更有说服力，更有心灵的撞击力。

与其在非议中改造经典，不如创造自己时代的经典，树立新时代的英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经典与英雄，我们不要死抱着祖宗的东西。要尽可能地创造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与英雄。让后辈对我们今天的经典怀念不已，那才是我们当代人的本领、当代人的骄傲。事实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讲述故事的本领、重新建构的能力是相当优秀的，他们表现自己的东西要真实得多，他们与社会大众贴得更近。《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士兵突击》等电视剧受到了极好的评价，也创造了一个个收视传奇，这些作品都较好地做到了思想性、艺术性、娱乐性、效益性的统一，这也为我们的当代影视人指示了一条连接观众与经典的阳光大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少一份浮躁，多一份沉静；少一份功利，多一份责任，共同打造属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经典，这是我们当前的文艺工作者最迫切的任务，是彪炳千秋的大事业。

(原载于《求索》2009年第3期)

新时期小说创作指瑕

新时期以来，文坛不再单纯澄明，小说创作从题材选择、艺术视角、人物塑造、表现手法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嬗变。各种流派交叉融合，蜂拥而出，令人眼花缭乱。然而在这热热闹闹的文学创作中，相当一部分作家因未能很好地把握方向，而在创作中造成了种种迷失和失误。这主要表现在：

主题淡化。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创作中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和强化成为一种共同趋向，这是集体主义贬值、“大我”被否定的思想产物。作家们逐渐缺失了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失去了关注当代生活的价值尺度，创作心态也显得困惑和游移不定。文学的价值在于创造出一种抗拒邪恶和失常的人文精神从而引导人们去改造现实，使之走向合理。然而作家们干预生活

的热情却随着心态的困惑迷茫而弱化了，对文学本身的社会教化功能却表现出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回避。尤其是像打着新写实主义、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等旗号的“新主义”作家们的作品，如池莉的《不谈爱情》《离婚指南》《你以为你是谁》、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徐坤的《如梦如烟》、方方的《烦恼人生》《风景》、何顿的《生活无罪》《太阳很好》《无所谓》、陈然的《喘息》、缪永《驶出欲望街》、李大卫《晨练时分》等等，无不呈现出淡化主题、淡化人物、贬斥典型、消解崇高的共同趋向。这些作家们以还原生活的原生态为主要特征，迷醉于“零度写作”，迷醉于平面化的叙述方式。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的表象，是人物在现实生存状态下崇高和理想不起来的庸俗、狭隘、丑陋和卑微的心理活动过程。我们从那种冗沓琐碎的原生态生活片断中看不到诗意的伤感和神圣的使命感，看不到文学对生命本体意识美的超越和升华。新时期还有许多作家的作品也是如此，或重在表达纯粹的私人化的生活体验，像陈染、林白、海男、毕淑敏、赵玫等女性作家的私语型小说；或热衷于叙事游戏和个体的心灵体验，极力在语言的所指和能指之间寻找张力，深度主题丧失，像某些先锋作家的先锋作品。所有这些都是逃避责任和使命的表现。在他们看来，世界就是一个平面，现象不再是本质的呈现形式。作家们只是滔滔不绝地在叙说，他们叙说的现象只是现象自己，别无其他。周恩来同志曾说：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得到鼓舞，受到激励，奋发起来。^①而如今的我们在翻阅上述作品时能激励起来、奋发起来吗？

写丑扩张。新时期小说创作长期以来体现出一种审丑的立场和态度。英雄主义和崇高的古典主义被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强大的沉浸于卑微、琐屑、消沉、平淡、荒诞、扭曲感觉之中的现代主义创作意识。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写的是女性的同性恋、自恋、恋父。张旻的《校园情结》写的是知识分子意淫。莫言的《红高粱》极力渲染的是暴力，特别是日寇杀人的情景多而细致入微，似在进行杀人手法的大展览。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王朔作品系列写的是公子哥们的游手好闲，以寻欢作乐，以调侃人生、知识、真理为乐。文青的《女儿·妻子·情人》描写的是婚外恋，苏童的《妻妾成群》写的却是封建社会最陈腐最落后的一

^① 周恩来：《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页。

面。汤吉夫的《本系无牢骚》却是满纸辛酸泪，而肖俊志的《阴阳际会》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军营的神圣面纱。还有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中的李鸣、孟野，尤凤伟《泱泱水》中的七姐和武生曲路，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刘庆邦《血劲》中的雄、秤锤、四真，刘恒《伏羲伏羲》中的杨天青、杨金山和菊豆，毕淑敏《原始股》中的沈展平，毕飞宇《雨天棉花糖》中的红豆，《第三只眼》中的司马戍，洪峰《瀚海》中的“我”，贾平凹《废都》中的庄之蝶、唐婉儿等等人物形象及所衍生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似乎作家们都在关注离奇失常的人生遭遇，都在展示卑微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都在关注原始洪荒的自然力和偏远地域民情风俗的神秘感，都尽力用扭曲人性冲淡历史和战争，都沉浸在对现实负面揭露的怪癖之中。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光。面对诸多的上述作品，我们不得不发出疑问：难道我们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仅止于此吗？难道文学的笔力就如此孱弱，以致经受不起丁点儿的英雄与崇高吗？

性欲泛滥。性是人的一种最自然的生命行为，冲破禁欲主义的禁区是文学和人类的进步。但性描写应该有个度：只应为描写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而写，为探究人性、推动情节发展、刻画人物形象服务，应符合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和东方美学气质，应尽量写得含蓄，侧重于性心理的、理性的、人的社会属性的挖掘，使性描写趋于艺术化。新时期的一些作家们不去探究正常性欲在繁衍生命方面的强大创造力，不去表现活泼的、健康的性欲，却对性破坏、性丑恶、性病态进行总体关注，在确认性本能的自然前提下体现自己的审美态度。翻开新时期作品，从通俗文学到严肃文学，从所谓的后现代派、先锋派到新状态小说、新市民小说、世情生态和城市民谣体小说等，莫不发现性的描写大胆得令人触目惊心，性情节的泛滥几欲令人窒息。在一些作家笔下，猥亵、撩弄人的描写比比皆是。如“浑身鼓胀难耐，动作逐渐深入”“它们（指天体，作者注）闪烁着温馨的粉红光芒，有的呈乳头状，有的是屁股形”“做爱时床上发出来的腥味”等。一些作家竭尽自然主义描写之能事，津津乐道于丑恶的性状态的展示。《废都》的作者不对庄之蝶们的变态心理和丑恶行为作更多的批判，而是一味沉湎在性的精雕细刻之中。还有一部曾获过巨奖的《丰乳肥臀》也颇有点让人浮想联翩。在作者的再三解释之下，人们才恍然大悟，丰乳不是真正的丰乳，肥臀也不是真正的肥臀，而是各有所指，有其象征意义，而打开书本，却看到作者似乎沉浸在描述性的